

我看清華文革

——讀《一葉知秋》

● 徐海亮

唐少傑的《一葉知秋》和沈如槐的《清華大學文革紀事》是首次出版的大學文化革命回憶與研究專著。唐少傑不是文革親歷人，他的研究是超出文革一代人所固有的政治文化範疇，從新的文化視角來的反思。



唐少傑：《一葉知秋——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鬥」》（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2004年春，我讀到唐少傑教授的《一葉知秋——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鬥」》（下引此書，只註頁碼）；繼而讀到沈如槐的《清華大學

文革紀事——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①。它們是首次出版的大學文化革命回憶與研究專著。唐少傑不是文革親歷人，他的研究，是後來者的反思，是超出文革一代人所固有的政治文化範疇，從新的文化視角來的反思。當代人寫當代史有其優勢與局限；後代人修史，閱歷雖不足，但有較為客觀的思維、學術環境，可能站得更高，對歷史做出全新的審視。在法國大革命的高潮後，就逐漸地形成了一個「復辟時代」的法國革命史學高潮，一批復辟時代的史學家，從各個方面來描述研究這場人類頭手倒立的運動，各有貶褒，推進了近代史學的發展，影響了法國歷史學，也影響着馬克思本人與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形成與發展。這些，是唐和許多人難以同意的，因為他多次講過，法國革命是一場革命，但是中國的「文化革命」從任何意義上都不是一場革命，兩相不能比較。不過，我和我的一些同齡人，依然從參與的

* 本文是壓縮稿，全文將在《二十一世紀》網絡版刊出。

直覺和理性的追求，把作為歷史過程發生的文化革命，看成在中國和世界歷史進程中，與法國革命可做比較的一次空前絕後的政治運動；這場特定條件下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在中國探索現代化的歷史長河裏，對觸發社會轉型的作用，今後會愈來愈被世人所認識。嚴肅的歷史學、深邃的歷史哲學問題，不是簡單與匆忙做一個政治結論和價值判斷就足以概括的。

《一葉知秋》的意義

唐教授把握住清華文革最根本的典型問題，關鍵就在於清華文革涉及中共最高層，觸及文革理論與實踐的一些根本問題。

寫民眾的文革史是本書最成功的地方。它從1968年「百日武鬥」切入，介紹了清華學生文革運動，其中所及運動「群眾基礎」，群眾與領袖、幹部的「互動」，群眾組織的「建制、運作」，群眾組織的「思想傾向」、「思想分歧」、「思想衝突」，無疑都是現今文革研究中最為缺乏的。文革這個由中共中央發動起來、民眾盛情投入的政治運動，其歷史進程的主體，究竟是一群備受崇敬的或指責的英雄豪傑，還是億萬民眾？認識很難同一。從唐著讀者不難看到，能動的學生群體對運動進展、徘徊、慘敗發揮重要作用。學生積極推動運動的走向，出現「英雄與奴隸共同創造」的局勢。脫離對歷史主體的研究，就無法在人文範疇真正弄清一個有億萬群眾參與的運動，難以理解它影

響和改變幾代人的生活方式、思想感情與理念的深刻作用，更無法給後世一個滿意的交代。

全書從1966年8、9月清華出現的三支紅衛兵，指出：「應該說只有清華井岡山紅衛兵抓住了清華當時文革的癥結所在」（頁6）。而當運動出現重大分化，出現所謂「團派」和「四派」的分野之後，「團派思潮是文革造反派的思潮或者說是激進的、極端的造反派思潮，它體現的是文革初期造反派群眾的正統思潮，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被毛澤東認同的思潮」（頁230），即團派是文革運動的主流派別。而「『四一四思潮』獨樹一幟，是唯一以文革前的正統觀念和正統秩序來批評、懷疑並進而大有可能否定文革的群眾思潮」（頁234）。

唐在清華文革的個案研究中，得出異乎尋常的認識，即強調億萬群眾對毛澤東文革事業的能動反作用，且準確地意識到文革運動裏類「加爾文」教派群眾運動的存在，而：

毛澤東不同於馬丁·路德的一點在於：毛澤東本人既是文革的「上帝」，又是文革的「改革家」……這也使毛澤東在文革初期具有了神與世俗領袖、改革家集於一身的耀眼光彩。（頁99）

在文革運動及群眾受到普遍指責的今天，認識這點比概念化地比附歷史上的暴民騷亂，要有意義得多。

最後，作者從「河歸舊道」，指出儘管毛澤東指責「四一四思潮」，把它當成一股右的思潮，但毛和中

從唐著讀者不難看到，能動的學生群體對運動進展、徘徊、慘敗發揮重要作用。唐在清華文革的個案研究中，得出異乎尋常的認識，即強調億萬群眾對毛澤東文革事業的能動反作用，且準確地意識到文革運動裏類「加爾文」教派群眾運動的存在，在文革運動及群眾受到普遍指責的今天，認識這點比概念化地比附歷史上的暴民騷亂，要有意義得多。

清華人本來就是各類精英階層子弟和準精英的集合，按蔣南翔的初衷，他們就是作為中共政治、科技精英來培育的。文革的每個重大環節都與清華相關聯，青年學子與高層精英的溝通互動，似乎清華觸動了文革的中樞，清華「井岡山」好似眾山之上的神山。前三年清華文革本身還幾乎沒有觸及到中國更廣泛和深層的社會衝突，他們還基本不明曉知識份子眼界以外的中國。

央文革並未部署批判這一思潮；說明毛澤東在口頭上和思想上反對該思潮，但在行動中或實踐中，他開始默默和迫不得已地認可了「四一四思潮」，「不僅如此，在文革結束之後，迄今為止，唯有『四一四思潮』取得了最顯著的、也是最重大的歷史性勝利」（頁243-44）。

作者認為：

四派與團派都是造反派，……以團派為代表的激進的、極端的造反派是文革的中堅力量。造反派的產生既直接得益於文革發動者兼領導者的意圖和支持，又符合文革自身的性質和要求……沒有造反派，也就難以有文革。若是沒有造反派，文革很難成為全國規模的、關係到億萬人民生活的群眾性運動，很難成為觸及到社會制度、國家政權及全民心靈的「大革命」（或曰「大造反」）。反過來，沒有文革，也就沒有造反派。正是由於文革，造反派成為中國政治文化史上和世界政治文化史上極為罕見的現行社會體制內的「反體制派」，成為被文革最高領袖一時許可甚至所鼓動的現行社會權威的所謂「群眾反對派」。（頁169-70）

唐著以武鬥作為切入點，但是對於清華「井岡山」的分裂，嚴肅的學人對其思潮的研討，自然要重於暴力探討。作者從對文革的理解，對文革前十七年、清華黨政幹部、知識份子隊伍的評估，文革的群眾運動的評價諸方面，詳盡地陳述了兩派的思路與言論，把握基本到位。該書基本尊重歷史實際，無有偏頗，具有較為深刻的反思。理性

的思辯無疑是清華文革運動對中國政治文化的歷史和現實的貢獻。當然，論戰的表述和概括，是否全部符合事實，全如對立面攻擊的那樣謬誤，又當別論。畢竟通過唐的記錄研究，留下一個歷史記錄，也點明了清華文革的永恆話題。

雖然一些更寶貴的實錄與研究正在討論和撰寫中，但唐著畢竟是第一篇。

《一葉知秋》的閃失

在控訴型文革是非回憶行將式微時，學者嚴肅的追究和反思——對歷史文化和社會動因考量，才可能成為思想陣地的強音。作者從中國對現代化道路的艱難探索來反思從五四到文革的歷史，無疑是較為深刻的。

在唐氏書裏，在沈如槐回憶錄裏，在一代清華人物的口裏和心底，是十分精彩的精英文革史。清華人本來就是各類精英階層子弟和準精英的集合，按蔣南翔的初衷，他們就是作為中共政治、科技精英來培育的。文革的每個重大環節都與清華相關聯，青年學子與高層精英的溝通互動，似乎清華觸動了文革的中樞，清華「井岡山」好似眾山之上的神山。但這僅僅涉及到文革所觸及到的政治問題表層，學校問題僅僅是社會的一個折射，清華文革也僅觸及中國文化歷史淵源的一隅。

在文革的頭三年，清華文革本身還幾乎沒有觸及到中國更廣泛和深層的社會衝突，儘管「井岡山」人忙忙碌碌地在全國串聯，他們才開



始認識中國——特別是中國的社會底層。他們還基本不明曉知識份子眼界以外的中國。他們熱中於上層政治鬥爭和運作，對北京以外的文革運動所暴露的更廣泛的社會實際，感觸不夠、理解不深，對軍人和社會底層的工、農要甚麼，不甚了了。四一四派「理論家」的周泉纓，幾乎也是「井岡山」上的一位癡僧，他在書寫〈我心中的文革〉前夕，就談到他從部隊農場到地方以後，才看到基層的社會，他懷疑是否「蒯派」對中國社會和中共的基本估計反而對了？他終於明白在清華的精英文革外，還有更廣更深的中國文革，在理性和瘋狂的追求之外，更有一個現實的中國。

作者在借鑑西方當代治學方法上下了許多功夫，而且為了研究清華文革，也涉獵了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和清華歷史著述，採訪了不少文革時期的清華人；但對於清華文革

人物心理深入和展開依然不足，或者作者意在清華文革全史裏再充分闡述？作者在諸如蒯大富、沈如槐、周泉纓、羅徵啟、陶德堅和其他本應栩栩如生的重點人物的交代和鋪陳上，都還過於簡練，他們的經歷、傾向、內心衝突、話語，他們為甚麼成為他們？給讀者的印象還不夠深刻。其實，他們的個人思想歷史和人生道路，非常鮮明地鋪墊和定格了他們在十年裏乃至後來的必然位置和價值取向。而這正是以社會學和歷史人類學方法剖析清華文革的重頭個案。

另一個應當重點描述的人物周恩來，不知何因，作者著墨十分清淡？周恩來是繼劉少奇之後，介入清華且分管清華運動的，面對「百日武鬥」這個中央頭疼的難題，周是甚麼態度？他心靈深處對書生們大辯論有甚麼觸動？在敲響紅衛兵運動喪鐘的「七·二八」談話裏，他

周恩來是繼劉少奇之後，介入清華且分管清華運動的，面對「百日武鬥」這個中央頭疼的難題，周是甚麼態度？他心靈深處對書生們大辯論有甚麼觸動？在敲響紅衛兵運動喪鐘的「七·二八」談話裏，他的價值取向可能是甚麼？與作者對毛澤東的清華情結濃墨潑灑相比，在《一葉知秋》中周的思想形象與風貌過於蒼白。

的價值取向可能是甚麼？與作者對毛澤東的清華情結濃墨潑灑相比，周的思想形象與風貌過於蒼白。周在當日足以披露心理的講話極少；誠然，此時無聲勝有聲。但唐書裏是該有聲的。

此外，也有清華人談到，作為紅衛兵運動的二十六個月，倒不如工、軍宣隊時期更為重要，後來的文革運動，才更多地體現了毛澤東本意的「鬥批改」和由此觸動的思想深層衝突。也許，這是我們走出了學校是非之地以後，未曾體驗和認識的更深刻的問題。為何毛澤東與尼克松 (Richard M. Nixon) 說：「我只改變了北京附近的一些地方」？我們研究者不解，有人說這就指的六廠二校。據說1975年陳雲勸鄧小平不要動清華、北大，說毛只有這幾個地方了。實際上，在文革的研

究裏，五十天 (實際為一百天) 的歷史，三年的歷史，十年的歷史，概念與實質是有區別的。望唐在今後清華文革全史的研究中，能關注這些說法。

此外，作者在段落結構上似乎刻意於時興的概念和話語，以及與國際接軌的功能理論框架，並且「議」的分量過於超越了「述」，以致後者稍嫌不足。英國魯德 (George Rude) 的《法國大革命中的群眾》(*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王紹光的《理性與瘋狂》，對群眾思想、語談、行為和抽象的取向的描述，就更為成功一些。這些作者也都沒有參與過當年的激蕩事件，而是靠查檔案資料和採訪當事人。

唐對學生代表蒯大富的描寫，脫出臉譜化和單純政治指控，但由於對於蒯氏的政治文化背景的浮

唐少傑對學生代表蒯大富的描寫，脫出臉譜化和單純政治指控，但由於對於蒯氏的政治文化背景的浮光掠影式的掃描，概括依然是欠圓滿的。圖為1967年5月1日晚毛澤東等接見全體北京革委會委員。周恩來指着蒯大富向毛澤東介紹：「這就是蒯大富。」毛澤東握着蒯大富的手說：「你就是蒯大富啊！」



光掠影式的掃描，概括依然是欠圓滿的。1966年夏，薄一波直言蒯氏就是反革命，名字就是反革命；1967年夏，林彪也言簡意賅地指出蒯氏反對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實際是反黨」。

唐在敘述領袖與學生互動裏，忽略了一些毛澤東早就對紅衛兵領袖的極為複雜與矛盾心理的披露。就在1967年初，毛澤東接見阿爾巴尼亞貴賓卡博(Hysni Kapo)、巴盧庫(Beqir Balluku)時，就說：

當然，聶元梓、蒯大富這兩個人，我們是在那裏做工作，說服他們。但是，這種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們還要看。不過，鬧起來總會有好人在裏頭。

到當年五一節，毛又對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說：

本來想在知識份子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在我看來，知識份子包括仍在學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識份子，從黨內到黨外，世界觀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的。

到9月毛又說：

中國歷次革命，以我經歷看來，真正有希望的是想問題的人，不是出風頭的人，現在大吵大鬧的人，一定會成為歷史上曇花一現的人物。

該書恰當地敘述和概括了清華學生兩派對於中共建國十七年來基本形勢的估計，以及部分還是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的原則分

歧。平心而論，當時絕大多數的大學生對這些問題，並未上升到如此的理性去探討，而是力求理論化和過份理想化的知識份子，予對方無限上綱，或自己托高論理「排球」奮力扣殺對方的辯論。本來蒯派和四一四派的分歧，沒有這些文革小報文獻說得那樣涇渭分明，那樣玄乎。如果蒯派真如四派攻擊的那樣，他們不早就成為中共文革派也絕對不能容忍的貨真價實的「反革命造反派」了？或者成為60年代的「民運人士」了？如果所謂四派的理論真如蒯派蓄意攻擊、四派奮力捍衛的那樣神聖，那不僅不須要搞這個該死的傷筋動骨的「文化革命」，也更不須要搞也是引發社會與文化、共產黨政治經濟基礎動蕩的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實際是：兩派絕大多數知識份子，爭先恐後投身於鄧氏開倡的改革開放，清華人畢竟是清華人。

作者提到清華「紅教聯」和它的頭頭陶德堅老師，基本引用的是文革派性辯論的資料，但沒有梳理為何朝氣蓬勃的青年共產黨員，卻始終是一個清華園的另類？對「紅教聯」所謂的異端傾向，特別是它對團派的影響沒有論證清楚，按四派所言，似乎這個異端正是兩派重大分歧的由來？文革紅衛兵材料，特別是宗派鬥爭的辯論，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四派斷然否認其思潮得益於政治成熟的幹部，團派今天也否認所謂「紅教聯」的意念驅動團派思潮。話說回來，陶老師被批判的話，似乎出自以前政治學習中的言談，原話也不是那樣講。這些問題，她在「新語絲」網站上的回憶

蒯派和四一四派的分歧，沒文革小報文獻說得那樣涇渭分明。如果蒯派真如四派攻擊的那樣，他們不早就成為中共文革派也絕對不能容忍的貨真價實的「反革命造反派」了？如果所謂四派的理論真如蒯派蓄意攻擊、四派奮力捍衛的那樣神聖，那不僅不須要搞「文革」，也更不須要搞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作者提到清華「紅教聯」和它的頭頭陶德堅老師，基本引用的是文革派性辯論的資料，但沒有梳理為何朝氣蓬勃的青年共產黨員，卻始終是一個清華園的另類？對「紅教聯」所謂的異端傾向，特別是它對團派的影響沒有論證清楚，按四派所言，似乎這個異端正是兩派重大分歧的由來？

錄，可能已經說明。前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羅徵啟後來坦承：當時四一四是把在社會上所有能收集到的他們認為是反動的言論，都放到陶的頭上。羅今天也講透了，他說陶老師是個很好的老師；院系調整和畢業分配到清華的一批天津大學同志，在1957年受到反右衝擊，許多人被打成右派份子，陶受黨紀處分，這些老師對學校的極左做法不滿，文革裏以另一種過激的形式表達出來。

這些，都是作者在研究清華文革全史裏仍須展開的。1957年，是60年代大學生在當時未曾認識的一個黑洞，不論是哪派，都在這把達摩克利斯的劍下徘徊。對清華文革歷史悲劇人物的反覆解讀，才能明白在最高等的學府裏，你死我活的派別鬥爭是怎樣演繹的；也只有在校全史中讀出了人性的寬容、理解，才讀懂了人格的真諦和文革史研究的永恆。

此外，對於工人的派性由起與發展，筆墨幾乎未及，是否工人僅僅在武鬥裏起到重大的物質作用？誠然，1968年以前的清華文革幾乎是大學生一枝獨秀，幹部、教師、工人的參與仍是有限的。

我看派性鬥爭

本書披露的文革學生組織宗派鬥爭，也留給世人更多的聯想。毛澤東那時講過，「派別是階級的一翼」，兩派學生都是最認真地把這個知識份子希冀盡善盡美地去鬥爭，把階級鬥爭神聖化。畢竟，這

些書生意氣的爭辯，也給後人留下無限的想像空間。在一切真誠探索社會變革的人群中，總是有二元的甚至多元的理念和主張，有激進或溫和，有革命和改良，一個群體或個人內心皆是如此？在清華，決非「四」河「團」界，鴻溝難逾，而是犬牙交錯，你中有我，「四」中有「團」的。

四派在1967年夏秋文革重要選擇和轉折的關頭，推出〈四一四思潮必勝〉，在校的理論框架內，懷疑與批評了文革及其造反派，嚴正批判了從文革小組到造反派群眾的極左傾向，應該說是很關鍵的一擊，從本質上說它是批判毛澤東繼續革命思想的。該文是文革異端思潮的重要文獻。可是，批左的文章，周泉纓又概括出左的認識。他明明在這篇批判團派的檄文裏鼓吹當時造反派認識一致的東西。周先生至今仍平心地確認團派和蒯氏比四派更貼近毛澤東的文革思想。的確，團派當時儘管錯誤百出，但他們的辯論，客觀上觸及到中國社會矛盾的聚焦點——共產黨執政以後如何代表人民？

從文革以後清華兩派頭面人物的遭遇，可以看到當初的分派，既很有意義，但在徹底否定文革的浪潮裏也變得幾乎毫無意義。因為兩者都是極端唯我獨尊的文革派，他們均被作為「三種人」或政治疏離者未進入體制內。誠然，部分當年大學紅衛兵依然以為，按自己的政治水平和策略，可以完成文革初衷，可以令政治清明、民富國強。為此也發生過真誠幼稚的辯論。我的〈50-60年代大學生與其特定時期政

治文化的關係》，曾反映了我的思考和一些懷舊討論結果②。

周泉纓說蒯大富認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沈如槐只認準專政本身；並直言不諱地說，不管哪派上台，都會對對方實行專政的，別以為你會去搞無產階級民主。這倒是說對了。唐少傑也嚴正批評對了。當年造反派迅速接過保守派使用過的極左武器，唯我獨革、唯我獨尊。他們聽過黨史，嘲笑和藐視王明，批判那坐在山岡上滾木雷石往下砸。後來，他們還嘲笑劉少奇是「紫禁城走出的馬列主義」。但他們畢竟沒有真正研究過黨史教訓，自己也成為「井岡山下來的」「天兵天將」，批判的武器居然變成武器的批判！

最後一個問題是帶總結性的第八章「歧路亡羊」第三段「歷史的輪回：評價紅衛兵問題」，該段在抽象意義上，與大學思潮關聯，但各種評價與概估，均來自於當年「老三屆」紅衛兵，特別是清華附中「老紅衛兵」。這樣，對象發生偏移錯位。大、中學紅衛兵有比較共性的東西，但也有很大的差別。文革以後文藝、歷史大量涉及的紅衛兵，其實往往只觸及中學生或者宣泄了「老三屆」的心聲。對大學生的研究基本上深藏官廳和民間，尚未公開。

在《一葉知秋》的後面，作者也留給讀者一些印象，即他在對治史方法本身進行探討。我相信這是他在哈佛校園裏那不眠之夜苦苦思索的歷史哲學問題。在歷史科學和文化借鑑問題上，我贊同多元和多邊的接觸、兼容。特別是對於中國文化革命這個世紀難題，任何寄寓一

隅或盲人摸象，最終都會是事倍功半甚至背離歷史進程的規律性、違背歷史事實本身的。因為，與其是堅持傳統史學的以宮廷政治、傑出人物為研究主體，不如借鑑社會學、語言學、社會心理學、文化教育科學，以至經濟學、地理學的理論和方法，從新的角度探討清華的文革歷史，乃至中國的文革歷史。

註釋

① 沈如槐：《清華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香港：時代藝術公司，2004）。

② 原文如下：

甚至紅衛兵自己，一旦掌權，也迫不急待地壓制、鎮壓其他不同意見的群眾和學生，有的還沒有掌權，就已經積極參與鎮壓其他群眾組織的運動。或許，大家都把政權當作了名副其實的鎮壓之權。紅衛兵以一種更強烈的形式的左傾，起來反對一切打倒一切；所有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地在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雄辯理由下進行的。本來十分理性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觀念，意外地卻變得荒謬起來。使人想起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中批評雅各賓黨人的革命恐怖，「恐怖成了荒謬」。

（《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通訊》，增刊第二二八期〔2000〕，www.cnd.org/CR/ZK00/zk228.hz8.html）

沈如槐直言：不管哪派上台，都會對對方實行專政的，別以為你會去搞無產階級民主。當年造反派迅速接過保守派使用過的極左武器，他們聽過黨史，嘲笑和藐視王明，還嘲笑劉少奇是「紫禁城走出的馬列主義」。但他們畢竟沒有真正研究過黨史教訓，自己也成為「井岡山下來的」「天兵天將」，批判的武器居然變成武器的批判！

徐海亮 高級工程師，長期從事水利歷史和國史研究，曾發表〈黃河史——自然篇〉、〈地理環境和中國傳統水利文化〉以及《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50-60年代大學生與其特定時期政治文化的關係〉等多篇論著。